



鼓楼史学丛书·区域与社会研究系列

# 清代桐城派文人治生研究

张秀玉○著

The study on the survival  
of tongcheng school scholar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鼓楼史学丛书·区域与社会研究系列

# 清代桐城派文人治生研究

张秀玉○著

The study on the survival  
of tongcheng school scholar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桐城派文人治生研究 / 张秀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203 - 1753 - 5

I. ①清… II. ①张… III. ①桐城派—文学研究 IV. ①I207.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4152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李寡寡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281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      |
|----------------------------------------|------|
| 绪 言 .....                              | (1)  |
| 一 关于选题 .....                           | (1)  |
| 二 研究现状 .....                           | (3)  |
| 三 本书内容意旨 .....                         | (6)  |
| 第一章 桐城派文人的治生观 .....                    | (11) |
| 第一节 桐城派文人义利观的继承与演变 .....               | (11) |
| 第二节 桐城派文人治生观念中的务实性 .....               | (25) |
| 第三节 桐城派文人践行治生观念的总体考察 .....             | (33) |
| 第四节 桐城派文人践行治生观念的个案考察——以方宗<br>诚为例 ..... | (38) |
| 第二章 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方式 .....                   | (49) |
| 第一节 做官之途 .....                         | (49) |
| 第二节 游幕治生 .....                         | (59) |
| 第三节 从教道路 .....                         | (71) |
| 第四节 其他途径 .....                         | (76) |
| 第三章 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收入 .....                   | (78) |
| 第一节 桐城派官员的收入 .....                     | (78) |
| 第二节 桐城派幕僚的收入 .....                     | (86) |
| 第三节 桐城派山长、塾师的收入 .....                  | (88) |
| 第四节 攻读者的廪饩与膏火 .....                    | (97) |

|                                 |              |
|---------------------------------|--------------|
| 第五节 收入对治生道路选择的影响 .....          | (104)        |
| <b>第四章 治生圈与桐城派的形成 .....</b>     | <b>(109)</b> |
| 第一节 以官员为核心的圈子 .....             | (110)        |
| 第二节 以山长为核心的圈子 .....             | (120)        |
| 第三节 以地域、宗亲为联系的圈子 .....          | (125)        |
| 第四节 圈子的交融性与流派的强化——以姚氏兄弟为例 ..... | (128)        |
| <b>第五章 治生对桐城派文学、学术的影响 .....</b> | <b>(140)</b> |
| 第一节 治生影响的桐城派文学创作 .....          | (140)        |
| 第二节 治生与桐城派学术研究 .....            | (149)        |
| 第三节 治生与桐城派形成的关系 .....           | (157)        |
| 第四节 治生与文学:以刘开和方宗诚为例的对比 .....    | (172)        |
| <b>第六章 桐城派文人治生与流派的发展 .....</b>  | <b>(178)</b> |
| 第一节 治生与桐城派的人才培养 .....           | (178)        |
| 第二节 治生与桐城派的著作弘扬 .....           | (189)        |
| <b>结 语 .....</b>                | <b>(208)</b> |
| <b>附录一 桐城派文人科举职业简表 .....</b>    | <b>(210)</b> |
| <b>附录二 清代文官品秩禄秩表 .....</b>      | <b>(276)</b> |
| 一 品秩表 .....                     | (276)        |
| 二 禄秩表 .....                     | (279)        |
| <b>主要参考文献 .....</b>             | <b>(281)</b> |

# 绪 言

## 一 关于选题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同时也是重要的学术流派。它兴起于清康熙年间，衰歇于民国，主要秉承程朱道统，尊崇秦汉及唐宋八家文统，绵延三百年，涉及一千多人，留下二千余部传世之作。百年来对桐城派的研究在文学理论、创作、学术思想、教育、文化思潮方面都有深入广泛的发展，有关桐城派研究的学术论文三千余篇，博、硕士论文二百余篇，专著及整理本二百多部，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热门的研究领域。桐城派作为一个整体，对它的内部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桐城派的文学，包括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作家群研究；桐城派的学术研究，包括经学、道统、老学、经世之学的研究。从外部对桐城派的研究，主要是关注桐城派与教育的关系，与社会思潮的关系，以及与当时一些重要政治和文化人物的关系。从采用的研究方法上来说，传统的文学研究仍是从陈述作家生平、分析作品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入手，逐个或成群解读桐城派作家和作品。实际上对于桐城派的古文研究一直都较为深入，从民国时姜书阁的《桐城文派评述》到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及吴孟复的《桐城文派述论》等，对桐城派的发展以及桐城派文论的发展变化叙述都相当周到深入，以后的研究多半是局部和程度上的补充研究。然而这种通过作家和作品逐一分析的纯文学研究是有瓶颈的，就是当你说完一家，再就这一家进行文学研究，若无新资料、新方法，就难以推陈出新，从而得到一个新的关于作家的文学研究的结论。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桐城派的发展至终结以后，到了一个可以进行历史的“层累”去认识的时候，我们总结前人的述评，会得出更多关于

桐城派的认识结果。这个阶段，桐城派的研究者发现桐城派并不仅仅是一个“文派”，而是综合的流派，有文学、有学术、有书画等，这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清晰的认识。如吴孟复于20世纪80年代末为《桐城文学渊源考》的整理本作序时提道：“就桐城而言，不仅有一个桐城文派，而且还有一个桐城学派”，“桐城文派之外，还有个桐城诗派”。<sup>①</sup>于是桐城派的学术、诗歌皆成为新的研究对象。<sup>②</sup>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这样的研究仍是不足的——即使研究领域被扩大了，从古文扩大到诗歌，从文学扩大到经学、史学，仍不足以说明桐城派在整个历史文化中的起落缘由和历史定位。就像苏轼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于是对流派的研究又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展，即从外部进行联系和交叉，相当于将一个苹果放到三维的坐标中去说明各个维度的参数和特征，而不再是只在苹果的内部说味道、说色泽。当然这个三维，不光是作品，是文论，还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教育状况、社会体制的影响。从非文学的维度解读文学流派，这就是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这个意义上的成果最典型的有吴微的《桐城文章与教育》和曾光光的《桐城派与晚清文化》，而这仍然是不够的。

就交叉学科研究来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已有很多理论和研究成果证明了它的重大意义。自然科学中，化学与生物学、化学与物理学、量子物理与信息学、生物与信息学等，都产生了新的交叉学科。社会科学中，发展成熟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交叉，产生了新的人类社会学。就文学和历史学来说，尤其是就中国的文学和历史学来说，传统学术中它们本来就是不分离的，现代的学科体系产生后才有了如此细致的学科划分。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身兼文学家是常态，如欧阳修、司马光、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赵翼、钱大昕等人，本身就学兼文史。受传统学术影响的陈寅恪，代表作中《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就是典型的以诗史互证为手段的文史兼通的

① 吴孟复：《序》，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页。

② 如更早早有王镇远的《桐城派诗论初探》，以后有邱美琼的《清代“桐城派”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以方东树〈昭昧詹言〉为中心》、吴建民的《经学与桐城派散文理论》、曾光光的《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等。

研究。当今学人中兼通文史以治学的也是大有人在。以徐雁平来说,代表作《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皆是在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问题的考述来认识文学和文化现象,取得了极好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无论从作家的生长、思想的形成到作品要反映的社会内容,都可以说:离开史学的文学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本书选题原因有三:一是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研究意义较大;二是其人物众多,时代较近,留存而可资利用的史料十分宏富;三是用一个新的维度看桐城派,可以得到较新的结论。希望将社会学和经济史的理论与方法引入桐城派研究,以清代科举、吏制、教育等制度为基础,结合大量的实例来论证桐城派的社会生活状况,拓展桐城派研究的理论与内容空间。

事实上,在开始研究之前,我确实完全不知道这群清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以什么养家糊口,他们挣钱多少,用度如何,除了纸面上所标榜的“安贫乐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他们实际的义利观如何,是否以道学之名行贪腐之实,是否在朝堂、讲案之外蝇营狗苟,以及他们如何成为桐城派的成员,如何使这个流派繁衍不休,最终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流派。这些问题如此有趣而未知,使得我很有兴趣每天去翻书查资料来证明或推翻种种猜测。我想这正是从事研究的意义所在。

## 二 研究现状

学术界对文人治生、经济因素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起步晚,发展不平衡。将社会生活、经济因素与文学相联系的认识和研究不深入,大多数文学史认识到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许多个案研究注意到知人论世,从人物的生平和社会生活来评述其人文学创作的內因。更深入地将文人治生、经济与文学相联系的研究起步较晚。21 世纪以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对于文学的作用,尤其是对文学的体裁、内容、风格方面的影响。如胡明认为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有四<sup>①</sup>:一、体现在文学作品与作家头脑里

<sup>①</sup> 胡明:《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学术月刊》2006 年第 5 期。

的经济意识与经济理念；二、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三、经济生活对中国传统文学生存发展的促进与制约；四、文学史人物微观具体的经济活动与其文学活动的关系。许建平认为，文学具有双重属性，既有精神的属性又有经济的属性，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精神属性与层面的研究，而应扩大为物质—经济属性与层面的研究。这样，文学的研究才能还其本原，文学研究被遗失的部分才能复原。<sup>①</sup>《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丛书的研究对象从先秦到现当代，涉及经济生活与文学关系的学理考量、宫廷经济生活与宫廷文学、士族经济生活与山水文学、地域经济与流派文学、城市经济生活与市民文学、家族经济生活与文学、宗教文学与宗教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许明说：“该丛书打通了文学研究与经济研究、社会研究之间的学科壁垒，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论域，填补了文学研究与经济研究、社会研究之间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空白，具有相当的开创性。”祁志祥在《文学与经济关系的学理考量》中认识道：“经济元素对文学的渗透，既可以导致文学成为经济的奴仆，也可以给文学创作更多的自由。”<sup>②</sup>许建平在《经济生活与文学活动之关系及其研究途径》<sup>③</sup>中也对这个交叉研究进行了理论探索。

关于文人治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治生论，就是研究古人对儒者治生的合理性的论述，包括治生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史。这是关于治生研究成果最集中的领域，主要论述了元代许衡关于治生的论断，即儒者为商贾可以治生，可以保节，这种与理学家身份似有不合的论述是各种论文进行分析的主要问题。其二是对明清两代儒生治生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提出了清儒认为治生是正当的，义利可以兼容，且治生对保证儒者独立人格有益，并论及对治生伤及义理的方面。如刘增合的《儒道与治生之间——儒教经济伦理观念中的对峙与融通》<sup>④</sup>等十余篇论文。其三是古人如何治生，属于经济学领域的方面，代表作亦有多篇。

① 许建平：《文学生成与传播的经济动因》，《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

② 祁志祥：《文学与经济关系的学理考量》，《云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③ 许建平：《经济生活与文学活动之关系及其研究途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④ 刘增合：《儒道与治生之间——儒教经济伦理观念中的对峙与融通》，《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

古代文人治生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明清江浙等文化和经济繁荣之地的文人治生情况的探讨。如徐永斌的《明清时期扬州与文人治生》<sup>①</sup>及《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文人与书画治生》。<sup>②</sup>

以往的研究对文人治生方式及经济状况与文学的关系关注不够。只有少量的专著和论文对文人选择塾师或幕僚的谋生方式以及经济状况对当时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这些专著和论文的研究成果可喜，得到了一些崭新的结论。同时有一些研究深入关注到文人职业特征和收入状况，推动了对文人生存状态的认识，对理解文人的文学和学术行为有帮助。如朱丽霞的《明清之交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以徐渭、方文、朱彝尊为个案》<sup>③</sup>，以明清之交三位著名文人的游幕生活为背景研究文学表现，是比较具体细致地对治生方式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周榆华在《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sup>④</sup>中关注到文人治生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指出晚明以文治生文人的出现，改变了士大夫长期主宰文坛的固有格局，使文学的话语权出现向社会下层倾斜的趋势；以文治生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推动了晚明小品的发展，他们的创作有力地影响了传统的“载道”文学观，也给士大夫文学固有的“温柔敦厚”文风造成巨大的冲击。将治生与文学表现的关系揭示得较为深入。吕靖波《明嘉靖文人游幕风气的忽炽及与文学之关系》同样关注到出于经济因素流动的幕僚与文学的关系：“这些游幕文人以布衣居多，其入幕的经济考虑要远大于政治动机，并具有更为自主和频繁的流动性。他们在幕中创作了大量的青词和以抗倭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前者促使骈文出现了短暂复兴的态势，后者则成为明代战争诗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⑤</sup>

研究中有少量论文关注到塾师的束修与教育水平的关系。闻洁《塾师经济待遇初探》<sup>⑥</sup>探讨了塾师整体经济待遇的种类，并撇开地域因素探

① 徐永斌：《明清时期扬州与文人治生》，《安徽史学》2011年第11期。

② 徐永斌：《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文人与书画治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③ 朱丽霞：《明清之交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以徐渭、方文、朱彝尊为个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④ 周榆华：《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⑤ 吕靖波：《明嘉靖文人游幕风气的忽炽及与文学之关系》，《齐鲁学刊》2011年第1期。

⑥ 闻洁：《塾师经济待遇初探》，《教育与经济》2000年第3期。

究了其个体经济待遇存在的具体差别及其原因,认为私塾的级别、类别不同,塾师自身素质的不同,会造成塾师的经济待遇也不同。陈宝良《说“教书匠”——明清塾师的生计及其形象转变》<sup>①</sup>对塾师的经济收入和职业形象也有深入剖析。

对桐城派文人的治生经济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目力所见,仅孟祥栋《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文学生产》<sup>②</sup>一文切实地关注到这个领域。该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近代文学生产密切相关。两代作家经历了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现代转型,家庭经济状况与传统士人‘文以载道’理想促成了这种选择。幕僚与传统教育职业对于桐城派文风的转变和现代文学心理建构的积淀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式教育和职业作家虽然给晚期桐城派提供了现代转型的平台,但也给桐城派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而其他从职业角度、经济(非经世致用,而是意指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因素论述桐城派的研究只少量地存在于桐城派文人的个案研究和桐城世家文学的研究中,且并非关注到治生、经济与文学的关系,只是将前者作为文学家的背景材料进行介绍。

文人生存方式及经济状况对文学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学界公认,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中。目前将社会经济状况与文学的具体表现相联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文学家、文学家群体的影响,或对文学体裁和风格的形成和影响方面。对文人治生方式与文学的关系也从个案到群体,逐渐有一些成果出现。总体来说,经济与文学相关性的研究是一种学科交叉性质的研究,通过经济因素来解释文学现象,会推动对文学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 三 本书内容意旨

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风格等观念层面,亦涉及科举等制度层面的论述。实则桐城派的形成与发展动力之一在于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方式,

<sup>①</sup> 陈宝良:《说“教书匠”——明清塾师的生计及其形象转变》,《文史知识》2012年第7期。

<sup>②</sup> 孟祥栋:《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文学生产》,《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即因谋生而形成的社会网络。换言之，经济因素不仅推动了桐城派的产生，也是桐城派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从治生方式即经济因素来研究桐城文派的流变，不仅有助于理解桐城文派发展历史的内在规律，也有助于理解桐城派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理念与内涵。本书从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方式入手，全面论述了治生与桐城派形成的关系，尤其是细致揭示了治生方式塑造的官员圈、幕僚圈、书院圈、地域宗亲圈对桐城派形成的作用，治生活动对桐城派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内涵的影响，治生收入与桐城派人才培养、图书刊刻等推动桐城派发展壮大重要现象的关联。

具体思路如下：

一是对桐城派文人治生的本体研究。本书分三章论述了桐城派文人治生的观念、方式、收入等，是对文人治生活动本身的深入探讨。第一章着重分析桐城派治生观对前人的继承和务实性特征，并以具体事例探讨他们重义轻利主张的真实性。第二、三章全面分析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方式及收入情况，按职业形态不同分别探讨，注意制度层面与实际情况的差异，将整体状况与个别事例结合分析，使论述内容尽量全面并客观可靠。

二是将桐城派文人治生与流派的发生发展结合起来，研究其内在规律。分为三部分逐渐深入：首先将治生活动形成的不同圈子与文学活动对应，说明流派本身就是由圈子构成。其次指出治生的需求对文学创作和学术的影响客观存在，但不是唯一原因，以刘开与方宗诚为例来说明。并以大量例证来说明风格和创作因素都不是流派形成的根本原因。最后以桐城派的治生收入对人才的培养和著作的刊刻情况来说明流派繁衍扩大的原因。

文中相关概念。治生：从字面的意思看，即为治理生计，并无可异议处。不过，治生的途径自古至今却在变化中。今人对于“治生”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内容。广义者，如王瑜、蔡志荣说“治生是指家庭财产的获得、合理使用及分配”。<sup>①</sup>狭义多指“货殖”，就是经商获

<sup>①</sup> 王瑜、蔡志荣：《明清士绅家训中的治生思想成熟原因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利的方式。这两种定义之外，又有大于狭义又小于广义的一种中等范围定义，即除了经商之外，包括务农、工匠的一类治生。本书所言治生指一切可以获得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经营，包括做官、教书、游幕等“本业治生”方式和力田、商贾等“异业治生”。<sup>①</sup>

文人和士人：这两个词本身含义略有差别，“文人”强调了人物注重文学创作的特点，往往与“学者”相对，“士人”基本上包括全部获取了功名的读书人。对本选题来说，这两者却是基本统一的。因为桐城派的人物多半因学习古文而列名于流派，而能留下名字在各种桐城派文学史上的人物，又基本都有功名。从词汇的常用角度出发，本书主要使用“文人治生”一词，然而在具体对人群和个人的探讨中，用“士人”更为准确，因为很多桐城派人物基本是纯学者，或纯官员，没有可称述的古文作品。另外本文所言“桐城派文人”，主要指有明确的师承关系的桐城派文人，也包括主张与桐城派一致，或有明确私淑桐城派言论的士人，以民国时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所列人物为主，另外也包括刘声木未列，而实际主张和创作皆与桐城派密切相关的一些人物，为明人物范围，特列《桐城派文人科举职业简表》附录于末。

本书内容概要如下：

第一章论述桐城派文人的治生观。论述古代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和桐城派文人对古代义利观的继承和演变；桐城派文人治生观在实际的家训和治生实践中的务实性特征。对桐城派文人治生观践行情况进行总体考察，论证历史上对他们“假道学”的指责并不客观，总体比其他文人品行并不更卑下；并以桐城派历史上“假道学”名声最甚的方宗诚为例，详细考证指责多半不实。

第二章论述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方式。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方式与清代其他文人并无太大的不同，以做官、游幕、从教以及守田、医贾等为主，此章有个别而至一般的意义，从桐城派文人群体的治生途径见有清一代

<sup>①</sup> 当前的研究者明确地把这种“士人通过自身的知识与智能同社会进行交换，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生存途径”称为本业治生，把“耕读传家、医卜杂艺、工贾自食”等非以知识智力为获利途径的方式，皆称为异业治生。见刘晓东《明代士人本业治生论——兼论明代士人之经济人格》，《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及刘晓东《论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

的文人生存之道。各节分职业而论，做官有科举、捐纳、恩荫、荐举之途。桐城派文人游幕人数和概况，游幕的特点、入幕方式及为幕之道。从教有官学和书院、私塾等不同体系，由于桐城派文人在各级书院影响最大，因而以书院山长为重点讨论从教方式，论证可得出山长之聘主要由书院的筹资方式决定。守田、医贾、食禀饩皆为治生来源，一并简述。

第三章论述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收入。与治生方式相对应，按照不同的职业来讨论收入。官员的收入除俸禄、养廉银等制度内收入外，因节礼等隐性收入使大多数官员的实际收入远大于表面收入，另又有人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官员存在，皆选典型实例来说明收入状况。桐城派的高级幕僚收入可观，州县幕僚的收入情况比较复杂，丰俭不一。教师的收入分山长、塾师，各有不同，差异巨大，各就不同书院、人物进行分析。分析桐城派文人在官学或书院等不同机构中所得廪饩、膏火状况及原因。分析收入影响治生选择的类型和原因。

本书后三章论述治生对桐城派的影响，分治生圈子对流派形成的影响，治生对流派的文学、学术的影响，以及治生收入对流派人才和著作的影响来论证。

第四章论述治生圈与桐城派的形成。桐城派可以划分成前后相继又互有交叉继承关系的不同圈子。用圈子来描述桐城派的状态，可大致分为以官员为核心的圈子，以山长为核心的圈子，以地域宗亲为核心的圈子。除梳理桐城派形成过程中各个圈子的状况外，并举桐城姚永朴、姚永概兄弟为例来论证圈子的复杂特征和交融情况。

第五章论述治生对桐城派文学、学术的影响。治生对文学的影响有多方面，最典型的是幕僚代笔之作和治生需求下的应酬文字，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单独成集极少，署名权不明晰，代笔水平参差不齐。应酬文字数量大，格式雷同，谀词较多。治生对学术的影响以经学为最，用力最多，成就较高，历史评价不一，争议较大。其中以《汉学商兑》引起的争议最为典型，考证方东树的谋食术与此著的关系。治生与流派的形成是本书最核心问题，论述了桐城派主要人物创作风格不一、文论也并不相同、甚至一些成员自身也并不认同的情况下被后代学者归入桐城派的原因。流派成员划分基本由圈子决定，同时产生了门派之见的弊端。以刘开和方宗诚的入幕自荐文为例，分析治生之需使得文章内容相近，

但文风是由个性决定的。

第六章论述桐城派文人治生的财力与流派发展壮大的关系。一是通过财力支持宗族教育来培养人才，二是通过财力刊刻著述促进传播和扩大影响。桐城派的官员对宗族公产的捐献力度最大，各家族财力不一，对子弟的培养作用极大，都注重了对穷困子弟的扶助。在政策上倾向对科举人才的培养，直至民国以后发生转变。通过这些人才培养的手段使文脉有厚实的人才基础，也使家族势力长久不堕。正因为家族经济参与到人才培养中，才可看到桐城派中往往兄弟父子、族属宗亲相继而学习古文，成为流派成员。桐城派的著述极丰，刊刻形式多样，分自刻、他刻、家族与地方文献及总集刊刻等不同状况，各作论述，皆基于财力实现。

## 第一章

# 桐城派文人的治生观

### 第一节 桐城派文人义利观的继承与演变

#### 一 儒家义利观的历史演变

义利之辩是古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此处仅就义利概念中的道德伦理及其在明清的变化进行讨论，并与桐城派文人的义利观念做一比较。在治生观念上，桐城派文人主要是将义与利作为两个对立的观念，舍利取义，或取利不害于义，都是将义、利这一对范畴放在个人的生计和道德中讨论的事，因此与哲学史上将义利与道德本质、与统治伦理关联的概念不同。贾新奇注意到历代义利之辩中范畴类型的差异及其论点的交错，其中义利关系中讨论最多的问题正是“关涉的是个人道德选择问题”。在道德生活中，是从道义出发还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尤其当道义与个人利益相矛盾时是选择道义还是选择私利，这是古代哲学家反复申述的问题”<sup>①</sup>。本书着重于文人治生，恰是从桐城派文人在义利选择上的特点说明治生途径及原因。

桐城派文人几乎宗儒学，儒学自孔孟以来对义利的探讨和争论都未曾中断。儒学的义利观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儒学所言义利，在个人道德选择上，自先秦至宋，主流皆舍利取义，或重义轻利，陈述之辞虽不同，基本意思一致。主要陈述如下：

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此句常被认为是君子重义而小人重利的意思。孔颖达说，“喻，犹晓也”，就是明

① 贾新奇：《论传统伦理学中义利问题的类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白的意思。且此处君子与小人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名称，而是指卿大夫与庶人。古代学者论述已详，尤以清代刘宝楠之说最为透彻：“如郑氏说，则《论语》此章盖为卿大夫之专利者而发，君子、小人以位言。”又说：“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贵贱以礼义分，故君子、小人以贵贱言，即以能礼义不能礼义言。”<sup>①</sup>将义利、富贵与个人道德品行相联系并为后世广泛接受的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以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主张利益需合于道，孟子继承并光大了这种观点，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并详解说：“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前者云义与生相比，义更重要，需舍生取义，后者与利相比，义也是至上的。孟子的陈述中，义利不可兼得时，义重于利。

西汉董仲舒言“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计其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重“道”与“理”而轻“利”与“功”。具体地说，董仲舒主张义利同养，但义重于利：“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义和利是精神和身体两方面不同的需要，但是义和利的价值是不同的，义重于利：“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宋以后的儒家学者将义利对立较多，重义轻利概念进一步被强化。宋儒重义轻利以程陆为代表。程颐与陆九渊将义利与公私对应，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sup>②</sup>陆九渊也说：“某尝以义利二字判儒释，又曰公私，其实即义利也。”<sup>③</sup>

明末清初理学家陆世仪认为货殖有害于学道：“货殖本非学道者所为，然许鲁斋曰，学者读书当先治生，凡货殖之类，皆可。似乎又无妨学道者。乙酉予既弃儒业，念无以资生，亦略从事于此，始觉得殊废学

① 刘宝楠：《论语正义》，岳麓书社1996年标点本，第100页。

② 程颐、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标点本，第176页。

③ 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标点本，第17页。